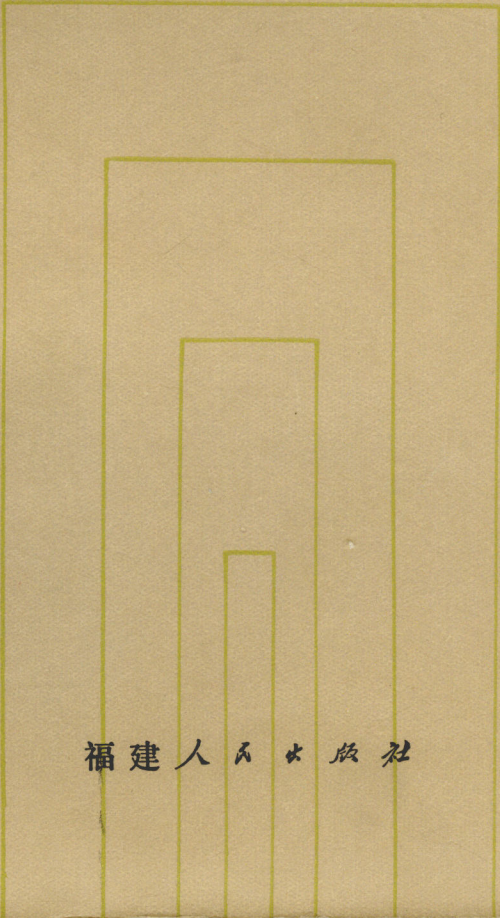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

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福建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

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福州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
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5印张 2插页 203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450

书号: 2173·21 定价: 0.85元

前 言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势下，我们迎来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无比的生命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美好的理想，而且已经在一些国家并将在愈来愈多的国家中成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领导广大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得来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思想。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这个结合的经验哲学总结和概括。

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我党的历史上，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两次历史性的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另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十年内乱，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经历一次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几次历史转变的经验充分表明，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理论基础的。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我党制定历次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十分丰富，毛泽东同志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各个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是人所共知的。还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是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中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因此，它是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的这个特点和优点，是需要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研究的。

近几年来，我省哲学界在开展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值此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汇集出版这一本论文集，一方面作为对马克思的纪念，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检查与总结。

今天，我们在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特别需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我们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在这个学习和研究中，逐步学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更好地为完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明祖凡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前言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林振坤 (1)

毛泽东同志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林仑山 (13)

学习毛泽东对国情的分析

——兼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邹永贤 (29)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贡献……………池超波 (47)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逻辑

——毛泽东在实践中运用辩证法的光辉范例……………商英伟 (66)

学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体会……………马 鸣 (83)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范例

——从“毛粒子”说起……………林可济 (98)

毛泽东关于全面性的哲学思想……………陈 军 (114)

毛泽东同志的波浪式发展观及其实践意义……………陈依元 (127)

学习毛泽东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论述……………姚安泽 (136)

坚持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学习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体会……………凌厚锋 (151)

学习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姚经桃 (166)

试论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思想……………丘一平 (182)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思想……………翁世盛 (199)

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

的理论·····	陈金振 (217)
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理论·····	周勇胜 洪成得 (23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伦理思想 的精华·····	沈忠俊 (251)
后记·····	(266)

(1) 毛泽东·····	陈金振 (217)
(2) 毛泽东·····	周勇胜 洪成得 (236)
(3) 毛泽东·····	沈忠俊 (251)
(4) 毛泽东·····	(266)
(5) 毛泽东·····	
(6) 毛泽东·····	
(7) 毛泽东·····	
(8) 毛泽东·····	
(9) 毛泽东·····	
(10) 毛泽东·····	
(11) 毛泽东·····	
(12) 毛泽东·····	
(13) 毛泽东·····	
(14) 毛泽东·····	
(15) 毛泽东·····	
(16) 毛泽东·····	
(17) 毛泽东·····	
(18) 毛泽东·····	
(19) 毛泽东·····	
(20) 毛泽东·····	
(21) 毛泽东·····	
(22) 毛泽东·····	
(23) 毛泽东·····	
(24) 毛泽东·····	
(25) 毛泽东·····	
(26) 毛泽东·····	
(27) 毛泽东·····	
(28) 毛泽东·····	
(29) 毛泽东·····	
(30) 毛泽东·····	
(31) 毛泽东·····	
(32) 毛泽东·····	
(33) 毛泽东·····	
(34) 毛泽东·····	
(35) 毛泽东·····	
(36) 毛泽东·····	
(37) 毛泽东·····	
(38) 毛泽东·····	
(39) 毛泽东·····	
(40) 毛泽东·····	
(41) 毛泽东·····	
(42) 毛泽东·····	
(43) 毛泽东·····	
(44) 毛泽东·····	
(45) 毛泽东·····	
(46) 毛泽东·····	
(47) 毛泽东·····	
(48) 毛泽东·····	
(49) 毛泽东·····	
(50) 毛泽东·····	
(51) 毛泽东·····	
(52) 毛泽东·····	
(53) 毛泽东·····	
(54) 毛泽东·····	
(55) 毛泽东·····	
(56) 毛泽东·····	
(57) 毛泽东·····	
(58) 毛泽东·····	
(59) 毛泽东·····	
(60) 毛泽东·····	
(61) 毛泽东·····	
(62) 毛泽东·····	
(63) 毛泽东·····	
(64) 毛泽东·····	
(65) 毛泽东·····	
(66) 毛泽东·····	
(67) 毛泽东·····	
(68) 毛泽东·····	
(69) 毛泽东·····	
(70) 毛泽东·····	
(71) 毛泽东·····	
(72) 毛泽东·····	
(73) 毛泽东·····	
(74) 毛泽东·····	
(75) 毛泽东·····	
(76) 毛泽东·····	
(77) 毛泽东·····	
(78) 毛泽东·····	
(79) 毛泽东·····	
(80) 毛泽东·····	
(81) 毛泽东·····	
(82) 毛泽东·····	
(83) 毛泽东·····	
(84) 毛泽东·····	
(85) 毛泽东·····	
(86) 毛泽东·····	
(87) 毛泽东·····	
(88) 毛泽东·····	
(89) 毛泽东·····	
(90) 毛泽东·····	
(91) 毛泽东·····	
(92) 毛泽东·····	
(93) 毛泽东·····	
(94) 毛泽东·····	
(95) 毛泽东·····	
(96) 毛泽东·····	
(97) 毛泽东·····	
(98) 毛泽东·····	
(99) 毛泽东·····	
(100) 毛泽东·····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的 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林 振 坤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①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每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因此，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乃是决定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胡耀邦同志在建党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新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路线。这几条总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制定这些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正确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并取得胜利，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既要懂得为什么要革命，又要懂得如何进行革命，从而能够提出正确的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规定的总任务和总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下略）第278页。

政策，它解决的就是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前仆后继，历经了八十年之艰辛，却始终没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俄国人的创举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走俄国人的路。但是，解决中国革命怎样进行的问题，却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在理论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有隶属关系，在实践上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因此，解决中国革命怎样进行的问题，就同如何对待马列主义理论，如何对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和指示，如何对待苏联经验有着直接关系。在这“三个对待”中，核心是怎样认识和解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列主义指导，而马列主义一般原理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得出的，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是他们所没有遇到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进行革命，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就是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从而产生了在中国革命怎样进行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党的杰出领袖，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解决中国革命理论和路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陈独秀、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都是脱离中国

的国情。特别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教条主义者照搬照套共产国际决议和马恩列斯的片言只语，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作了主观主义的分析，企图超越历史阶段，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九一八”事变后，又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同蒋介石反动统治有矛盾而主张抗日的第三势力（中间势力），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在革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他们照搬照套苏联的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不断地组织城市起义，强迫弱小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这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招致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失败，并使白区工作遭到全面的破坏，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因此，不同这种教条主义作斗争并克服它，就不可能真正把马列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怎样进行的问题。因而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

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反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出发点，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质上就是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恩格斯曾强调：“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① 教条主义的要害，就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则。尽管他们并不直接反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前提，但是，他们却在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上，颠倒了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因此，要彻底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就必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页。

把它提高到哲学上来认识，必须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才能解决问题，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的这种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第一次指出主观主义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他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从哲学上总结了党内路线斗争。他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离开实际调查进行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这就进一步从两条哲学路线对立的高度来揭露主观主义的实质，并针对教条主义在“三个对待”上的错误，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主观瞎说和懦夫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必须把上级机关的指示同斗争中的主客观情势结合起来，反对盲目照搬的形式主义。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正确路线和斗争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他把这些称之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②这篇光辉著作明确提出把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把马克思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8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19—25页。

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化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包含了后来所概括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识中国社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方法的哲学概括，标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这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应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为着解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制定党的路线和策略的需要而产生的。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纠正了教条主义者先冒险后逃跑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胜利完成了长征。这个时候，党面临着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党从指导思想到路线、方针、政策，都要有一个适应新情况的转变。在实现这个转变中，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王明，这个时候又照搬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和指示，犯了类似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说明，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解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成为顺利地完 成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倡导全党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身体力行，亲自给干部讲哲学，组织学哲学小组。他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总结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中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进行哲学概括，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这些著作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又突出地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以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

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真理，并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概括，特别是这样三个方面：第一，阐明了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认为不仅要研究一般规律，尤其要研究特殊规律，指出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合，这是犯不犯错误的根本界限，揭露了“左”倾和右倾、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根源及其特征，强调指出，把主客观统一起来，这是争取革命和战争胜利的关键。第二，精辟地论述了如何在实践基础上，遵循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实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并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第三，科学地阐明了在事物发展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并把辩证法用于认识论，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②的科学论断以及一套坚持共性个性相联结，具体地分析矛盾特殊性的科学方法。这些重要的概括不仅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哲学基础，而且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标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成熟阶段。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探讨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运用于解决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更好地相结合。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为了更好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必须开展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和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三位一体的任务，学会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具有民族形式、“中国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72、295页。

作风和中国气派”^①。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九四一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把他所阐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根据这些原理所制定的思想路线，正式概括为“实事求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后，通过延安整风这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这条科学的思想路线为全党所掌握。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就是随着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而解决的，这就是党的“七大”所制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的经验 的哲学概括，是具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实事求是的核心和出发点，它是我们党最基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客观事物不仅是具有内在规律的发展过程，而且是处在普遍联系中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因此，实事求是地研究事物就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从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同周围事物的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原则。实事求是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要求我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因此，它又是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科学认识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59页。

线。总之，实事求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认识路线又是工作路线，也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一思想路线对于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意义在于：第一，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正确的政治路线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列主义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它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它们属于具体领域的理论学说，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等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制定，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下，运用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武器，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等基本问题，使根据中国的特点应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了可能，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实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路线提供了根本依据。同样，建国初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路线，也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第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又是正确理解党的政治路线，统一全党认识的基础。世界观的统一是最根本的统一。实事求是既是制定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又是正确理解这些路线的指南。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为全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统一全党认识的基础，是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指导思想和总路线上来的可靠保证。第三，实事求是也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锐利武器。实事求是就是反对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产物，它不仅要求制定政治路线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且要求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也必须在实践中做到主客观情势相结合，这就为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指导，并成为反对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武器。从民主革命的历史看，正是因为有了这条科学的思想路线，并通过延安整风，使这条路线为全党所掌握，才能正确地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达到了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才有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并制定了“七大”的正确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八大”的十一年时间，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顺利地实现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制定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是我党历史上取得辉煌胜利的十一年，它说明了，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就能够通过实践达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制定正确的路线，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党的“八大”总结了“七大”以来的辉煌胜利和宝贵经验，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这个时候我们党对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因此，“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

得不到贯彻。虽然在这个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任务，也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等光辉著作，并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和工作方针，但是，就整个说来，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由于胜利而不谨慎起来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当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觉这种“左”倾错误之后，曾几次着手纠正，但是，由于思想路线没有端正，结果不仅“左”倾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恶果。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其根本错误就在于违背了马列主义原理，脱离了中国实际，脱离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时间里，虽然党和国家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思想路线上陷入新的教条主义，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因此，从指导思想到路线、方针、政策都继续着“左”倾错误，使工作上出现了徘徊，经济建设上还出现了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洋跃进”。使党和国家摆脱这种“左”倾错误，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也是靠端正思想路线，这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二大胜利完成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我们党就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文